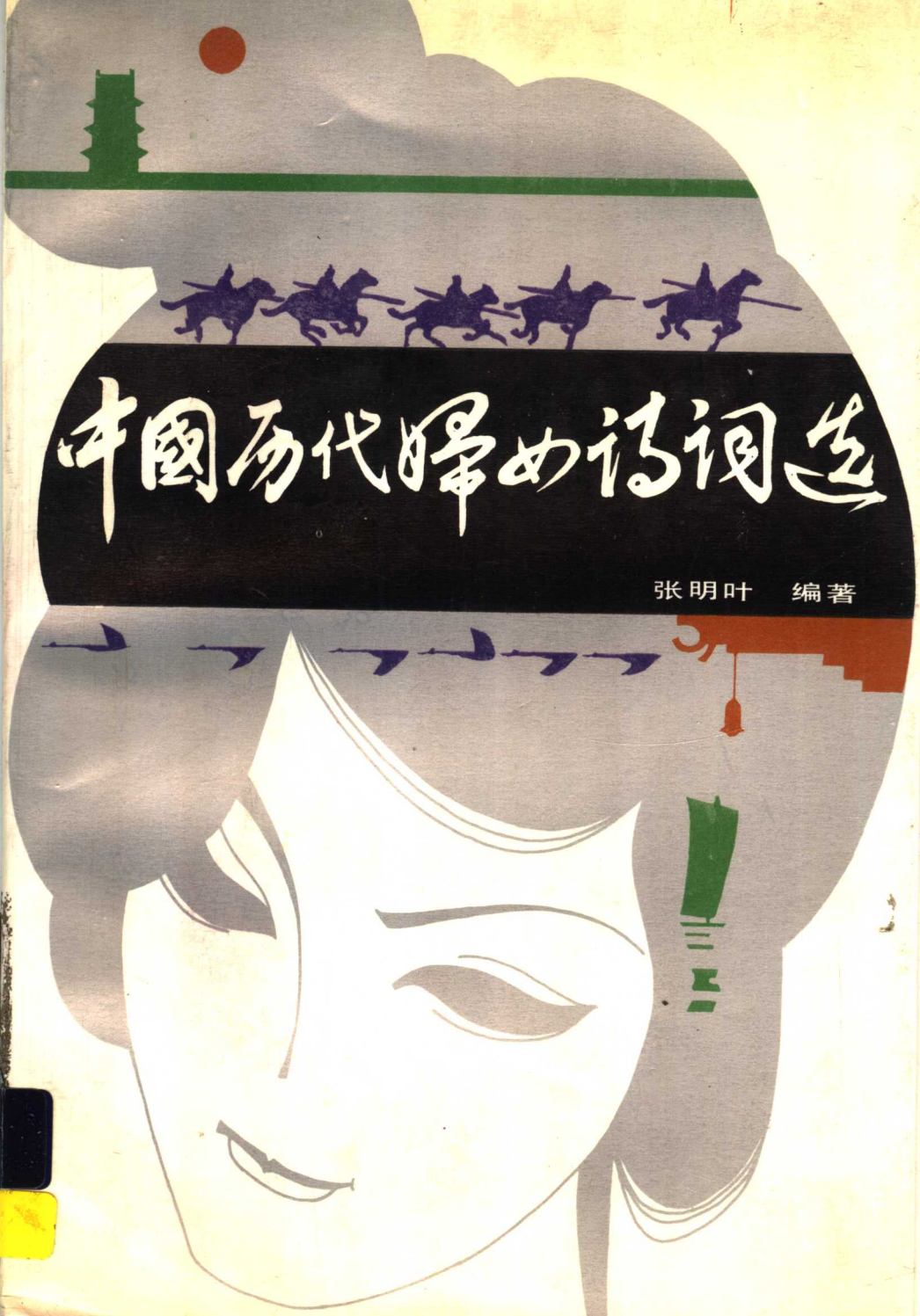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large, stylized illustration of a woman's face, rendered in a traditional Chinese artistic style. The face is pale with dark, expressive lines for the eyes, eyebrows, and lips. The hair is dark and styled in a traditional manner. Above the face, there is a horizontal band containing silhouettes of five riders on horseback, each holding a long spear. Above this band, there is a green silhouette of a pagoda on the left and a red sun or moon in the center. Below the face, there are stylized green and red elements that resemble traditional Chinese architectural details or decorative motifs.

中國歷代婦女詩詞選

张明叶 编著

中國歷代婦女詩詞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中国历代妇女诗词选

张明叶 著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320,000 开本:850×1168¹/₃₂ 印张:16.3125
印数:1—4,000

1989年9月第1版 1989年9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沈国经 封面设计:安今生

ISBN 7-5382-0939-5/I·31

定 价: 5.50 元

前 言

古代诗词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珍贵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而历代妇女诗词则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翼。

妇女从事文学生活，是源远流长的，从人类社会出现的那天起就开始了。据传说远在伏羲时就有了琴瑟，制订了婚嫁之礼；女娲嗣伏羲，又作笙簧，乐器所兴，诗歌继作。故《诗疏》谓神农时已有诗。若如此，妇女从事文学生活亦宜始于皇时。因为上古之民，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所以无男女尊卑之分，乐歌播习，应是男女所同。神农时既有诗，妇女岂无为诗者？只是时代悠远，篇章湮灭，举不可考，仅其理可推知而已。虽《拾遗记》载有皇娥《清歌》、《穆天子传》录有西王母《歌辞》，但都是后人伪造或依托，不足为据。倒是一些典籍中关于“东、西、南、北”四音中北音与南音最先，且皆起于妇女的记载，值得研究。

北音，相传为简狄所作，它来源于“简狄吞燕卵而生商”那个故事。《吕览·音初》：“有娥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帝令燕往视之，鸣若溢溢，二女爱而争搏之，覆以玉筐。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返。二女作歌，一终曰：‘燕燕往飞。’”这就是北音之始。

南音，相传始作于涂山氏之女。它虽后于北音，但其流布之广却为北音所不及。《吕览》：“禹行功，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候禹于涂山之

阳。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高诱注：“南方国风之音，取涂山女南音以为乐歌也。”

以上两则记载虽系神话，然而神话却是现实生活曲折的反映，它也足以证明妇女从事文学活动实在是要早于男子的。

流传至今的最早的而且是真实可信的文学，应推《诗经》。但可以说，《诗经》里面有不少篇章是出自妇女之手。谢无量说：“周时民间采诗，兼用老年之男女任之。其诗亦必男女均采，故《诗经》中宜多妇人之词①。”谢晋青则说：“十五国风存诗一百六十篇，其中有关妇女问题者八十五篇②。”篇数的多寡是不必拘泥的，其中多少篇分别为某某妇女所作也不必多究，但《诗经》中不乏妇女抒情写怨的作品这一事实，恐怕是毋庸置疑的。

《诗经》以后的历代各朝，由于时代的偏见，封建社会里的妇女比起男子，在精神上更多受了一层重压。封建卫道者们把妇女视为“红妆祸水”，把大至时代铸成的过错、封建统治者的昏庸残暴、国家的内乱衰亡，小至举家不兴、人口不蕃、时序物象不验等等不吉之事，都统统归咎于她们。《汲冢周书》中就有这样一段话，说是一年之中，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应时的现象，如果这种现象没有出现，妇人就要做坏事。它们是：

一、春分之日，元鸟不至；妇人不信。

二、清明又五日，虹不见；妇人苞乱。

三、立冬又五日，雉不入大水；国多淫妇。

四、小雪之日，冬虹不藏；妇不专一。

五、大寒之日，鸡不始乳；淫妇乱男。

“元鸟”、“虹”、“雉”、“鸡”与人有什么相干？而妇女的贞淫信乱，自己不能裁制，反为那些禽物支配，真是绝

妙的荒谬！但就是这种荒诞不经的诃诿之说，使封建社会里的妇女在它的面前抬不起头来。在这种无形的精神重压之下，她们要挺直身子做人，争得与男子享有平等的地位，那是根本办不到的，社会只允许她们按照“三从四德”和“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信条来做人。她们的才华被窒息了。她们从事文学活动的权利被剥夺了。这就是我国古代妇女诗词遗留至今较男子诗词要少得多的根本原因。

关于这点，曾有人这样说过：“窃思闺秀之学与文士不同，而闺秀之传又较文士不易。盖文士自幼即肆习经史，旁及诗赋，有父兄教诲，师友讨论，闺秀则无文士之师承，又不能专习诗文，故非聪慧绝伦者，万不能诗。生于名门巨族，遇父兄、师友知诗者传扬尚易，倘生于蓬荜，嫁于林俗，则湮没无闻者不知几凡^③。”论者虽是撇开了封建社会对妇女的精神束缚和种种歧视性的苛求来立论的，但他毕竟还是承认封建社会里的妇女“不能专习诗文”，其能诗者，也传播不易，“湮没无闻者不知几凡”这一事实。

前面说过，《诗经》中有不少抒情写怨的作品是出自妇女手笔的，但今天能据古籍确指的却不过十余人。她们大概要算我国古代最早而且可信的女诗人了。其中申女、卫宣夫人、庄姜傅母、许穆夫人等人的诗，表现了她们作为一个真正的女性所具有的坚强性格和反抗精神以及美好的心灵。

春秋战国时期，兵乱频繁，人民生活困苦，妇女作者不为多见。鲁漆室女、越采葛妇、越王勾践夫人、百里奚妻杜氏等，她们的诗，是这个时期战乱生活的真实反映，某些作品表现了对国事的关心、对人民的同情。

汉初的诗坛极为寂寞，妇女作者绝少。虞姬《美人歌》，后人疑为伪托，汉高祖唐山夫人《安世房中歌》，虽被封建时

代的文人誉为“极大文字”，其实只不过是《诗经》和《楚辞》的混血儿，毫无意义，不足称道。戚夫人的《永巷歌》，倒还是抒心之音，词凄情悲，不失为汉初妇女的代表作。到了汉武帝时，政局稳定，国家强盛，经济日趋繁荣，作为它的上层建筑的文化也随之繁荣起来。由于乐府机构的设立，大量的民间歌谣被搜集整理，为汉诗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途径，也为妇女作者崭露头角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名闻后世的妇女作者有班婕妤、卓文君、王嫱、乌孙公主刘细君、徐淑及苏伯玉妻等。她们留给我们的作品虽然不多，但都是时代的脉搏，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东汉末年，皇室衰微，军阀并起，社会动乱不安，人民饱尝丧乱离别之苦，悲饮弃国背乡之恨，愁与苦，死与别，悲与恨充塞心间，难以为声。少帝唐姬《唐姬歌》（亦称《抗袖歌》），是汉室衰亡，军阀专权和暴戾的写照。诗虽几句，但它打破了当时妇女诗坛的沉闷局面，功绩仍然是不可小视的。继后，蔡琰的《悲愤诗》，以整齐的五言形式，叙写了自己的悲惨遭遇，反映了人民在战乱中所受的痛苦，引起了强烈反响。

魏晋六朝，妇女作者的队伍扩大了，不仅宫廷后妃、公主命妇、勋臣妻妾、民间闺秀已经攀折了诗的桂冠，就是生活在社会最低层的乐倡妓女也欣欣然涉猎诗坛。前者如甄后、胡太后、沈满愿、乐昌公主、谢道韞、苏蕙、绿珠及苏若兰等是，后者如苏小小等是。

隋代兴亡，如过眼云烟，但它在文学史上却上承六朝余绪，下开唐代先声，是一个转变的关键时代。《子夜》吴声，《横吹》北歌，在六朝已登峰造极，至隋代统一天下，混合南北思想，文学也随之一变。妇女作品如丁六娘《十索》，犹存《子夜》遗风，而侯夫人《自伤》、《自感》诸诗已宛然唐人之作。只是因为时代太短，诗人太少，本选本没有将这个时期

的妇女诗人单独列出，而附在六朝之后了。

隋灭唐兴，其诗一变。五、七言诗到此时已发展成为一种格律定型化的近体诗。中唐以后，是近体诗升华的黄金时代，名家辈出，奇峰迭起，几乎成为独步文坛的“天之骄子”。在这时代的影响下，又有武则天（她曾撰文介绍回文诗的创始者苏蕙）和上官婉儿的提倡，妇女援笔作诗的相继不绝，而且蔚然成风。当时著名的有武则天、上官婉儿、李冶、鱼玄机、薛涛、关盼盼、刘采春、杜秋娘、花蕊夫人等。

宋是诗衰词盛的时代。李清照、朱淑真是宋代女诗人中的两大家，她们不同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作者的影响很大。其余如魏夫人、孙道绚、戴石屏妻、辽世道宗、天祚两后等，其作品也蔚然可观。

元代，真正形成统一的政治局面不过七、八十年。在这短促的七、八十年间，诗词面临着一次大的挑战，那就是曲的兴起。妇女作者还来不及适应这种新的形式，就改朝换代了。所以，元代的女曲家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可以肯定，她们用固有的旧形式言志者居多。知名人物当数郑允端、管氏姊妹、张玉娘及罗爱卿等。

自诗三百篇后，“诗歌之道，无虑三变：一盛于汉，再盛于唐，又盛于明^④。”朱明王朝，妇女作者人材辈出。梁乙真说：“孟淑卿、朱妙端不愧为初期之杰，陆卿子、徐小淑（媛）等堪称中叶之雄。至于末世，若吴江三沈、叶氏诸女尤为秀出……^⑤”实际上远不止此，且不尽然。如陈懿德、曹妙清、张妙静、黄峨、徐灿、方维仪、柳如是等，她们也是名噪一时的女诗人，并且，从某个方面说，她们比梁氏所列举的几位更为出色。

入清以后，封建统治者加紧了对妇女思想的禁锢和防范。

但是，物极必反，清代妇女的思想比它以前的任何一个朝代的妇女的思想都要活跃、大胆而解放，女诗人之多也是空前未有的。“妇学而至清代，可谓盛极。才媛淑女，骈萼连珠，自古妇女作家之众，无有逾于此时者矣^⑥！”这话不虚。据有关资料统计，清代仅有事迹可考的妇女作者几及千人。明末清初，以顾之琼为首组织了妇女自己的文学团体——蕉园诗社。其后，此风日盛。雍正、乾隆时期，袁枚曾公开为女性鸣不平说：“女宠虽自古为患，而地道无成，其过终在男子^⑦。”并首创招收女弟子的学馆，传授他的“性灵”诗说，刊刻她们的诗作。由是妇女为诗者与日俱增。至清末，仅刊有专集者数以百计。在清代享有盛名的女诗人，莫过于“蕉园诗社”的成员、随园女弟子、双卿和清末的女革命家兼诗人的秋瑾。

以上就是我国古代各个时期妇女作者的概况。从这个简略的叙述中，我们大致可以知道：我国历代妇女作者数以千计，其诗词在万首以上。但由于封建社会的妇女备受歧视，作为她们言志的诗作不为社会和人们所重视，轮到搜到总集里去的时候，只落得排列在僧道之后；倡伎之诗却只能在鬼怪之前了！更有甚者，绝大部分的妇女诗词就连这样的待遇也享受不到，我们今天只能从各种类书、野史、笔记、方志等典籍中偶尔见到它们。这是极不公平的。因为妇女诗词无论就其数量及反映社会生活面之广上，或是就其艺术的造诣上而论，都是不可小视的。

历代妇女诗词，特别是下层妇女的诗词，它以形象的历史，反映了从先秦到明清两千多年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妇女的思想、愿望和情感，有着相当的广泛性和深刻性。

第一，爱国主义的思想感情，贯穿着妇女诗词的始终。封建社会把妇女变成男子的附属品，她们一旦失去一切依恃后，

成了乱离人，沦为异国妇，那生活的艰难，境遇的悲惨，实在是不堪设想的。正是此种原因，妇女较之男子，更希望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所以她们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忧虑，比起男子来是更深一层的。

我国最早的女诗人之一的许穆夫人，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爱国的贵族妇女。她虽身嫁许国，贵为君后，但当她出生的卫国为异族人所侵占时，思归慰其兄，并图复国之计。然而，她的这种正义的行动，却遭到许国大夫们的反对，致使她迟迟不能成行。她在《载驰》之诗中，主张卫国应向大国求援，收复国土，并对许国在卫危亡时坐视不救表示了无限愤慨之情，充满着爱国情绪。

“春秋战国之时，国家丧乱已极。忧时之士，每多激发之言。而风气所播，即编户处女，亦往往关心国事^⑥。”这话是有根据的。

鲁漆室女，爱国忧民，常倚柱悲啸《处女吟》。但她却不为人们所理解，“怀忠见疑”，终至以身殉国。

越王勾践夫人，在越亡后与其夫入吴共侍吴王夫差。她在渡江离国时，怀着恋恋的凄惋的怀国之情，写下了《乌鸢之歌》，表达了她的亡国之恨，去国之痛。她为了国家的复兴，忍辱含垢，入吴后，虽“妻衣褐令为婢，夫去冕令为奴”，而面不做露愠色；还国后，又与勾践勤于农织，苦其心志，终于达到了雪耻兴国的目的。

越王勾践自吴还国，卧薪尝胆，立志复国。知吴王好服，使国中男女入山采葛，作黄丝布以献之。吴王大喜，赠越之封，赐羽毛之饰、几杖诸侯之服。越采葛妇伤越王用心之苦，作诗以道其意。从诗的内容来看，这个一般的平民妇女，已把国家的命运，君王的忧患苦乐与自己联系到一起了。

东汉末年的蔡琰，尝够了沦为异国妇的那种“欲死不能得，欲生无一可”的滋味，所以她对自已的故国有着不同常人的深厚感情。当“有客从外来”时，她“闻之常欢喜”，喜出望外地去迎问故乡的消息。当故国来使奉命接她归国时，她出于对自己国土热爱的炽热情感，把来使视为亲“骨肉”。当她意识到回归久别的故土虽是“亡得自解免”，但到“当复弃儿子”时，刚刚在心间浮荡着的喜悦，顿时为“存亡永乖隔”的忧愁与悲哀所掩盖。然而，故国在召唤着她，使她从愁苦、悲哀、怅惘的深渊中自我解脱了出来，在归与留的关键时刻，她选择了前者，忍痛割断了几女私情，毅然踏上了回归故国的征途。这实在是需要有一点爱国的勇气的。

一个爱国诗人，必然对统治阶级的各种辱国丧权的罪行怀着强烈的憎恨，并进行尖锐而激烈的谴责的。宋代的李清照、徐君宝妻以及清末的秋瑾，就是这样的爱国诗人。

李清照流传下来的诗，虽只是断章零篇，但却可以从这有限的诗篇中看出她内心深藏着的炽热的爱国热情。作于金兵入侵之后的两首《和张文潜读中兴颂碑》诗，作者用托古喻今的手法，对误国的昏君奸臣，表示了强烈的谴责，对国家的祸乱，表示了关切和悲愤。她的《夏日绝句》和逸句“南渡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以及“两汉本继绍，新室如赘疣。所以嵇中散，至死薄殷周。”等诗，忠愤激发，意悲语明，对一味逃跑、屈膝求和投降的、毫无收复国土之志的昏君庸臣们予以辛辣的嘲讽。她的这种爱国感情表现得更为明显而激烈的，还是她晚年所作的《送胡松年使金》一诗。

李清照是公认的“婉约派”的正宗词人。由于她坚持“词别是一家”，囿于那种传统观念，她的词的题材就不及她的诗那么广阔，词中所表现的爱国思想也不及诗中那么激愤。但她

南渡后晚年所作的词，因为敌人的入侵，国家河山残破，加上她个人家破人亡和颠沛流离的不幸遭遇，它们所流露出来的心情是极为沉痛的；它们所反映的内容也就不仅仅是个人的不幸，而是带有时代和社会的因素了。在《永遇乐》（“落日熔金”）一词中，作者对南宋小朝廷屈辱求和，苟安江南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的行径委婉地表示了深愁和沉痛。不过作者的那种对国家衰亡的深沉的切肤之痛，是熔铸在她自己满目凄凉的晚景的描绘之中的。难怪宋末爱国词人刘辰翁在读到此词时要“为之泣下”，并和作了一首词了。有人说，读李清照的词，可以窥知其身世变迁：早年之作美而艳，中年之词感慨生情，晚景则满目凄凉。这话是知人知情之论。只是在她晚年的满目凄凉之作中，却也蕴蓄着她对国家的兴亡之感。

徐君宝妻，是宋末的一位爱国女词人。这位没有留下姓名的机智而刚毅的妇女，在国破家亡、身陷敌手的时刻，用血泪写成了一首绝命词——《满庭芳》。在这首词里，作者不仅写出了个人和家庭的不幸，而且还对南宋统治者偏安误国，致使外患日深，终至失国的罪行予以深刻的揭露，对国家和人民的惨遭浩劫感到无比痛心。她虽然“魂断千里”之外，但对沦亡的故土怀着无限的眷恋之情，虽死也要魂游故土，“夜夜岳阳楼”！一往爱国深情，注入文字，掷地有声。

秋瑾，是清末以诗词见长的女革命家。由于满清政府腐败无能，对内加紧压迫，聚敛财富，以满足最高统治阶层的私欲；对外忍辱求荣，开门揖盗，勾结外来入侵势力，镇压国内人民的反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而且已经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人民反抗压迫，抵御外侮，推翻满清统治，驱除外国侵略势力的呼声日益高涨，斗争遍及全国各地。在这呼声和斗争中，秋瑾是最勇敢、最坚决、最彻底地与旧世界决裂

的一个，她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以她雄浑豪放的诗词，不断唤醒沉睡中的人们，使他们从中看到曙光和希望，从而奋起投入到改变现实的斗争中去。她的《感愤诗》，充满了革命的雄心壮志和对祖国危亡的感叹。她深感“国破方知人种贱”，强烈要求改变这种现状，纵然“经营恨未酬同志”，也要“把剑悲歌涕泪横”。她的这种强烈要求改变现实的理想，在《黄海舟中》一诗里，表现得更为突出。她已深知依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唤起千百万群众才有实现的可能，所以她大声疾呼：“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她的词也和她的诗一样，充满着战斗的激情和爱国的热忱。例如《如此江山》，作者把自己孤苦飘零的身世与祖国的命运结合了起来，抒发了她对“外侮侵陵，内容腐败，没有英雄作主”的祖国的无限忧虑之情。可以说，在封建社会里，秋瑾是第一个以笔为武器向旧世界宣战的女诗人和女革命家。这的确是中国妇女的骄傲。

第二，真实地、直接地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悲惨命运和劳苦大众的苦难生活，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对人民的同情。这在下层妇女的诗词中表现得尤为显露而真切。这是因为“被压迫而在挣扎中的女子，她们的呼声，每字每句都是纯真的情调^⑩”。

陆游的前妻唐婉，在“世情薄，人情恶”的封建社会里，因为不容于恶姑而被休去。她改嫁后，“怕人寻问，咽泪装欢”，在“病魂常似秋千索”的苦苦煎熬中“怏怏而卒^⑪”。

双卿，这个出身农家的女诗人，在“姑恶夫暴”的家境中，备受虐待，终于“劳瘁以死^⑫”，其抒写遭遇之惨的诗词，令人不忍卒读。例如《惜黄花慢·孤雁》，在这首词中，作者将自己比作无依的孤鸿。这里是“稻梁初尽，网罗正苦，几处寒烟”，“去向谁边？”哪儿才是她的归宿呢？无情的现实告诉她：人世间已无她的立足之地了。无怪乎陈廷焯在评论

此词时说：“读竟令人泣数行下^⑫。”其余如《薄幸词·咏虐》、《凤凰台上忆吹箫》等，都是“其情哀、其词苦^⑬”的血泪篇。

唐婉和双卿，她们的悲惨遭遇只不过是封建社会里妇女命运的缩影，被封建礼教作为祭品的又何止她们两人！

嫁后从夫的妇女，一旦成了育孤的寡妇，倘是平民之家，那境遇是很凄楚的。汪宜秋的《春夜》、赵恭人的《祭灶》等诗，为我们作了这方面的真实写照。

从汪宜秋的《春夜》一诗中，我们不难揣想她生活的拮据。春夜本是使人易倦、睡意最浓的时刻，但作者因为生活的缘故，却“坐愁换过烛三条，才向妆台卸翠翘。”这还是她记起明朝“花朝”日，“只恐睡迟难早起”，误了上市卖花，才提前早睡的。可以想见，她平时为了生计，不知要“坐愁换过”几条烛了。

赵恭人的《祭灶》诗，将一个孤儿寡妇的穷迫家境如画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她在夫亡子幼的情况下，尽管苦心经营，但在“多尘土”的破屋里祭灶神的时候，除了“聊将清水饯行尊”外，其他一无所有。

为生活所逼迫，为环境所诱惑而沦为倡伎的妇女，受着非人的待遇，她们的生涯是更为凄苦的。她们有难言的苦衷，但又不得不强颜欢笑，去迎送那些前来寻欢的人们。她们抒写愁情的诗词也最为怨苦。如宋长安妓聂胜琼，她在《鹧鸪天》一词中写道：“寻好梦，梦难成，有谁知我此时情？枕前泪共阶前雨，隔个窗儿滴到明。”将那悲绝欲倒的凄怆心情，呜咽写来，读后简直使人窒息。这里面，有的变得放荡不羁，玩世不恭，以示对现状的一种无力的抗争；有的则想摆脱那种屈辱的生活，如唐代的关盼盼、姚月华，宋代的严蕊、郝温琬、周韶

等是。但她们大都是从火坑跳出，却又掉进了深渊。

由于封建统治者毫无节制的占有欲，加紧对人民的压迫剥削，致使一般的劳动人民在正常的情况下也难以存活，如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即使付出加倍的血汗也是无以为炊的。这时，他们的绝望心情是不难想象的。毛秀惠的《岸水谣》，就将那种景象再现了出来。作者对夏天久旱不雨的田间景状，农人全力抗旱的辛劳及其精疲力竭后依然于事无补的绝望心情，都作了目睹伤神的描写。“男妇足茧更流血，村村尽呼力已竭。”这体现了作者对生活在苦难深渊中的劳动人民的同情心，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关于爱情和婚姻问题在妇女诗词中占着很大的比重，而且这类作品常常带有反封建的色彩，表达方式上也大多具有质朴、热烈而大胆的特点。

这里面，有的诗表现了妇女对自己丈夫的深厚情义。徐淑的丈夫秦嘉去洛阳赴任，而徐氏因病留居母家。后来，他们互相赠诗问候。我们从徐氏的《答秦嘉诗》中，不难看出他们夫妻之间相敬如宾的深情厚谊。苏伯玉妻的《盘中诗》，其辞虽多怨苦，而用意忠厚，她对当初与她“结巾带”的丈夫表示“长相思”，永不相忘。冯淑妃《感琵琶弦》，表白她“虽蒙今日宠”，但“犹忆昔时怜”，对原来的钟情男子依然不忘旧情。晁采《春日送夫之长安》、崔素娥《别韦洵美诗》、屈安人《送夫入觐》等诗，都极细致地描写了她们别夫时的难舍难分的情景。鲍令暉《古意赠今人》、《题书后寄人》，刘采春《罗唢曲》，羽仙《寄夫征衣》，侯氏《龟形诗》，陈玉兰《寄外征衣》，葛鸦儿《怀良人》，刘彤《寄外》，魏夫人《菩萨蛮》，宋凌云《偶成》等诗词，都是发自肺腑，写得情深意厚的望夫回归之辞，或是寄托相思之情的作品。商景兰

和曹雪芹的继室芳卿的《悼亡》诗，都是悼念亡夫的诗。特别是芳卿的诗，痛苦悲绝，几不欲生，说明在曹雪芹生前他们夫妻之间感情绸缪。

有些诗，表现了男女之间的纯真爱情。爱情本是人类一种特有的感情。无论是贵为帝后，或是贱为倡优，她们的“心镜”都会时时映出爱情的情影。文姜本人的品行是不足称道的，但她《复诸儿》一诗，却蕴含着爱的热情，语粗而不俗，情显而不露。胡太后在《杨白花》诗中，毫不掩饰地将自己的爱情献给杨华而不耻于失身臣属，这就可见她在爱情上是何等的大胆，属意是何等之深！贾蓬莱原与上官粹有约，而父母将她许字林氏子，上官粹怨而作《凤分飞曲》寄给她，贾蓬莱作《龙剑合曲》回赠他，以雌雄龙泉剑终归必合，示终身相从之意。诗虽是典故的堆积，艺术上的价值有限，但情意可鉴。熊澹仙在她的《蝶恋花》一词中，生动细腻地将一个少女心中“爱芽”萌动，刺绣到鸳鸯双飞时，“背人笑向红窗倚”那种“私自喜”的情状逼真地再现了出来。

爱情的不自由，是私有制的产物。封建社会里，妇女为了争取婚姻自由，付出了血的代价。然而，她们的正义要求和美好愿望，在封建制度下是无法实现的。尽管如此，她们对爱情的渴望是任何力量也压抑不住的，伴随着这种渴望而进行的追求和反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周之申女，汉之卓文君，唐之红绡、李节度妾、步非烟，宋之朱淑真、苏小妹，元之王莹卿，明末清初的柳如是等，为了爱情，有的与情人相约幽会，有的私自出奔，有的则公开宣言：“生得相亲，死亦何恨④！”有的却以死相拒强娶自己的男子。

由于她们的大胆，爱情生活在她们的诗词中也得到大胆的表现。李节度妾在她的《书红绡帕》二首诗中，毫不讳饰地表

白自己不爱“金珠富贵”，只是向往真正的爱情，“常渴佳期”，毅然采取书红绡帕的果敢行动，“偶用志诚求雅合”。最后，她终于脱出牢笼，与自己的情人比翼双飞。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宋代朱淑真，她在爱情问题上一生不得志而死，对爱情的追求最为强烈而大胆，并且不避一切嫌疑和蔑视封建道德。她的《生查子》一词，写元夜与情人相约会而情人不至的情景，感情真挚，文笔活泼而通俗。由于她敢于这样大胆地冒犯封建道德规范，竟被卫道者们诬为“失德妇”。但她对此却不屑一顾，在其稍后的《清平乐》一词中，更有恃无恐地向封建的卫道者们挑战：“娇痴不怕人猜，和衣睡倒人怀。”爱情的烈火越烧越旺，任何狂风暴雨也扑灭不了。

不过也有一些弱者，她们虽然不满于自身的婚姻现状，但却没有勇气改变这种现状。崔氏嫁了一个比她年岁大得多的老头，心虽不满，但她只能以“自恨妾身生较晚，不及卢郎年少时”一朝了事。崔紫云对“忽见便叫随命去”的年事已高的“霜台御史”不能不说有着蕴积于心的愤懑，但她毕竟只能从命归去。苏小妹虽极不愿意嫁给母兄之子程之才为妻，但在“乡人婚嫁重母族”传统观念的重压之下，“虽我不肯将安云！”诚然，不满就是反抗，但这种反抗是不能改变现状的无力反抗。然而，在封建社会里，一个柔弱的女子能够这样也是极不易的事。

宫闱红怨，是宫女们人身、爱情不自由的反映。妇女诗词中表现这方面内容的也为数不少。这些诗词中，既有怨恨，悲和愁，也有着大胆的追求和反抗。据记载，唐代玄宗、德宗、宣宗、僖宗时，都曾发生过禁闱少女御沟流叶寄诗和袍中书诗寄人的事。可见这种办法，已成为深宫少女们所采取的一种表白爱情反抗现状的形式。如《袍中诗》、《题花叶诗》、